

科举学的学科与专学辨析

方泽强,张继明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1992年刘海峰先生提出创建科举学,从而引发了关于科举学是学科还是专学的争论,可谓见仁见智。在严格意义上,科举学当前是专学而非学科,但这并不否认科举学将来成为学科的可能性。学科与专学的区别不在于两者的学术水平有高低之分而在于两者的发展取向和资源获取渠道不同。科举学的学科和专学争论隐藏着利益诉求,但是在逐利同时不能忘却“学”的本真蕴义:探索知识,指导实践。

【关键词】 科举学;学科;专学;诉求;蕴义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18(2012)04-0029-03

【作者简介】 方泽强(1981—),男,广东惠来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张继明(1979—),男,山东潍坊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

刘海峰先生于1992年在《科举学刍议》中提出创建科举学,指出“目的在于将科举研究纳入一个新的学科体系,使科举研究走向理论化和系统化”^[1]。此后,科举研究便呈星火燎原之势不断扩散,一股持续的“科举热”在学术界产生、兴盛起来。与此同时,关于“科举学是学科还是专学”的科举学性质问题引起科举研究者的关注和争论。

一、学科与专学的争鸣:见仁见智

对于科举学的性质,学术界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科举学是学科而非专学。廖平胜认为“科举学是现代考试科学体系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2]。田建荣在《科举学:理论、体系与方法》则称“科举学是一门研究科举发展历史,进而揭示考试发展规律的学科”^[3]。第二种观点认为,科举学不是学科而是一门专学。郑若玲认为“科举学是一门研究过往考试制度及其运作历史的专学”^[4]。覃红霞则认为“科举学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演进发展的历程及社会对科举学的需求、科举学研究与社会职业的对应等关系决定了科举学是一门专学”^[5]。对于学科与专学的关系,覃红霞认为“学科与专学或研究领域之间的差异,只代表知识发展中的不同方向,并没有研究层次上的高低之别”^[6]。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科举学既是学科又是专学。刘海峰认为“科举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专学,……同时,科举学又是一门交叉学科,一门发展中的学科……”^[7]。李均在《从专学到学科——“科举学”的应然求索》提出:科举学目前处于专学阶段,并将最终进入学科阶段,专学是科举学从萌芽走向成熟的阶段^[8]。显然,

对于学科与专学的关系,李均持有“专学是科举学发展的过渡阶段,学科则是科举学发展的成熟阶段”的观点。换句话说,学科在研究层次和水平上比专学更高,这与覃红霞“学科与专学没有研究层次上的高低之别”的观点迥然有异。

在对上述观点进行思考的基础上,笔者认为:首先,在严格意义上,科举学当前是一门专学而非一门学科,但需要强调的是,科举学在将来完全可能成为一门学科;其次,学科与专学在学术质量和研究层次上不存在高低之分,这是最根本的;再次,学科与专学的区别在于两者的发展取向和资源获取渠道不同,具体而言,学科倾向追求知识维度和社会建制维度的统一,特别是在大学获得建制(特指建立学系),且学科发展更依赖于大学提供资源,而专学则更倾向追求知识探索而不太刻意追求社会建制,且专学发展更依赖于社会提供资源。以下简论之。

二、学科与专学的度量:标准审视与关系辨析

学科是什么?沃勒斯坦认为:学科首先是学术范畴,即有明确的研究领域,且具有领域界限以及公认的研究方法;其次是组织结构,即有学科命名的系,教授们有本学科的职称,学生们争取学科的学位等;最后是文化,属于同一学术团体的学者们具有共同的阅历和研究方向等^[9]。学科不仅包括知识维度方面的内容,而且包括社会建制方面的内容。有研究者据此提出学科成立的判断标准。在知识维度,学科需要满足5项条件:(1)特有的学科定义和研究对象;(2)时代的必然产物;(3)学科创始人和代表作;(4)精心营建的理论体系;(5)本学科的科

研究方法,即本学科独特的研究方法^[10]。在社会建制维度,学科大体要有5个部门:(1)学会;(2)专业研究机关;(3)大学的学系;(4)图书资料中心;(5)学科的专门出版机构^[11]。某类知识要同时满足知识维度和社会建制维度两方面的条件才能称为一门学科。以高等教育学为例,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被教育主管部门批准成为学科目录内的一门学科,这表明高等教育研究已获得社会建制,同时,高等教育研究在研究对象、学科创始人和代表作、理论体系等方面也满足相应要求,如出版《高等教育学》(1984年),因此高等教育研究是一门学科。事实上,其它称为学科的也莫不是满足知识和社会建制两个维度的条件;相反,倘若有某类知识不能同时满足知识维度和社会建制维度的条件,则该类知识不能称为学科。当前科举学虽然满足知识维度的条件,但却没能符合社会建制维度的条件,如教育管理部门还没有批准它列入学科目录并在大学成立学系,因此,在严格意义上,科举学当前不是一门学科。

专学指的是一种专门学问或专门研究领域。“世上本无谓学,研究的人多了,便成了学。”^[12]事实上专学的产生和发展大致遵循上述路径,即某研究对象引起了众人关注,随后,研究人员越来越多,成了一定气候,于是专学便出现了。所谓红学就是以《红楼梦》的作者、版本、脂砚斋评以及“佚稿”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红楼梦》诞生之日起,对它的研究也随之开始。北京士大夫阶层在光绪年间把研究《红楼梦》的称为红学。民国初年,红学逐渐成为一门专门学问,蔡元培、王梦阮等学者都对《红楼梦》进行过系统研究。至于敦煌学则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敦煌史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在19世纪中后期,一些外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先后到敦煌参观莫高窟并开始研究。随后,在欧洲召开的东方学会议上,匈牙利人洛克齐介绍了莫高窟的艺术,莫高窟研究的影响开始扩大。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研究敦煌莫高窟并逐成气候,敦煌研究随即在20世纪初开始成为一门专学。从专学的发展历程看,笔者认为,某类知识称为专学包括如下标准:(1)具有研究对象;(2)具有研究方法;(3)具有理论体系;(4)具有一定数量的研究人员。只要一门学问符合上述条件则可称为专学。与学科相比,专学更侧重于知识维度的探究,它为研究兴趣而追求学术而并不刻意追求社会建制。当然,专学发展至一定阶段时也产生了相应的研究机构、学会,如红学研究者在1980年成立中国红学会,但这并非红学一开始就刻意追求的,亦非它出现后红学才称可以称为一门专学的一项标准。根据专学成立标准,科举学完全能够符合,因此,科举学是一门专学。

那么,学科与专学是否有研究层次上的高低之

分?笔者认为,专学与学科不存在着“专学是一门学问发展的过渡阶段,而学科则是成熟阶段”的说法。事实上,专学往往具备了学科在知识维度上的若干条件,例如敦煌学,它以敦煌遗书等为研究对象、有考古等科学的研究方法、建构了独特的敦煌学的理论体系,而这是学科在知识维度最重要的标准。一门学科最根本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对象、方法和理论体系^[13]。在社会建制维度,专学往往在成立学会、专业研究机构等方面也都能达标,如红学、朱子学就有相应红学会、朱子研究所等,而一般只在大学成立学系这一方面不能达标。但是,某类知识获得大学建制成为学科不足以说明学科的学术水平比专学的高。一门学问能否在大学建制往往跟政治经济社会需要等因素相关,而往往与它的学术水平和质量无直接关系。在19世纪,东方学成为学科有特殊背景。当时,东方民族国家开始觉醒,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面对这种新形势,西方国家希望借大学之力来研究东方各国,所以东方学在大学获得建制。经济政治诉求是东方学在大学建制成为学科的主要动因。若非如此,东方学显然只是游离于大学围墙之外的一门专学。不论在大学内还是在大学外,东方学的研究层次和学术质量并无不同。

此外,学科与专学有高低之分的臆断也与对大学地位的错位认识有关。“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14]大学往往成为高深知识与真理的象征,成为评判知识水平和质量高低的把门者,人们习惯于把大学生产出的知识贴上高贵的标签。相反,如果某类知识不是大学生产并获得大学认同建立学系,那么,该类知识的水平和质量就得打点折扣。17世纪的大学视衍生发展于大学之外的自然科学为一种低级技艺,为此阻止其进入大学成为教学课程,但是恰恰是这种产生于大学之外的知识推动了产业革命,带来了划时代的变革。以知识是否在大学内生产或者能否获得大学建制来作为判断知识水平高低的标准显然不太科学。吉本斯(Gibbons)等指出,在20世纪初,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转变促使知识生产模式发生改变,学院科学时代的知识生产模式1(指知识只在大学内生产)已被后学院时代的生产模式2(指知识生产可以同时上大学、公共机构、研究中心和工业实验室生产)所代替^[15]。大学的知识审判官和把门者角色已悄然褪色,大学之外的社会机构、团体、人员等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来源,其生产的知识在水平上并不比大学生产出的知识水平差。所以,游离于大学外的专学在知识水平上不见得比学科低。实质上,学科与专学代表着不同的发展方向和资源获取渠道,体现为:学科倾向追求知识维度和社会建制维度的统一,特别是在大学获得建制,且学科更多

地依托大学资源,而专学则更倾向单纯地追求知识探索而不太刻意追求社会建制,且专学更多地依托大学外的各种资源,学科和专学的区别仅此而已。此外,学科与专学在知识水平上并无高低之分,那么,某类知识或者最初成为学科而后也可能退出大学成为专学,或者是最初是专学而后由于某些社会因素影响进入大学成为学科。从这个角度讲,尽管科举学当前是一门专学,但不能否认它将来有可能成为一门学科。

三、学科与专学的考究:争论诉求 与“学”之蕴义

事实上,科举学是学科和专学的争论隐含着一定利益诉求。首先它涉及科举学的定位和发展问题。毫不夸张地说,历时1300多年的科举制主宰着封建社会的兴衰沉浮。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科举制是一个逝去的历史古物,科举社会也远离现代社会的范畴,科举文化业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今日对科举制这一“古物”进行研究时就需要找到一个合理的研究定位,正其名,明其位。一般的说,倘若科举研究能在大学获得学科建制则意味着知识维度和社会建制维度得到双重认可,意味着能够获得更丰富的资源,因为大学学者、专家等人力资源、相对充足的研究经费、众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以及学术自由的氛围等将更有利于科举研究的深入推进;相反,倘若科举研究不能在大学获得学科建制,则意味着它只是一门专学,更多的是从社会上获得发展资源。尽管学科与专学在研究层次上无高低之分,但学科在资源获取方面无疑更具优势。其次,它关系到科举研究者的利益问题。作为一门学科,它除了要在知识维度上建立严密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以促进知识系统化外,更重要的是还要在学科人才培养制度、学科准入制度、学科评价制度等方面进行建设。“它们(学科)拥有一个更强大的机制,即控制学生结束训练以后的职业类型,甚至还能反过来规定或创造社会对知识需求的类型。”^[16]这一系列工作作为学科划定研究边界,能够捍卫研究者的利益诉求。而作为一门专学,它只在知识维度上倾向于形成对某类研究对象的系统化认识而往往无意于类似于学科准入制度、人才培养制度等一类的外部建制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某类研究在大学内获得建制,则更能保证研究者的利益。相对地,某类研究如果在大学外发展,则它的地位可能会受制于人财物资源、研究环境等而无法使研究者的利益得到最充分的保障。

确切地讲,无论是学科还是专学,首先它们都是学,即学问或者说是某个领域的系统化的知识;其次,学科和专学才是具特殊内涵的学,即前者是追求

知识维度和社会建制相统一的学,而后者则是重在追求知识探索的学。学的价值何在?一方面,学问产生目的在于发展知识,认识世界;另一方面,学问产生和发展的目的还在于推动实践,改造世界。由此看来,“学”的价值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认识世界,即对某一领域形成系统化的、综合化的认识,使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不断增强;二是改造世界,即应用系统化的知识解释、指导、预测现实,推动实践更好发展。此两方面正是“学”的本真蕴义。专学也好,学科也罢,不论其发展取向、资源获取渠道等有何区别,都不该偏离“学”的蕴义。知识发展是主,社会建制是辅,后者服务于前者,则是追本溯源,则合乎学问发展的轨道;相反,社会建制为主,知识发展为辅,后者服务于前者,那就舍本逐末,偏离学问发展的轨道。因此,研究者必须专心致力于科举学的探索知识和指导实践两方面的工作,如此,科举学将成为21世纪一门显“学”;至于科举学能否获得大学建制成为一门学科,研究者可以抱着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心态视之而无需太过执著。

【参考文献】

- [1] 刘海峰. “科举学”刍议[J].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2(4): 89-95.
- [2] 廖平胜. “科举学”研究与教育价值取向的制导[J].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9(4): 19-21.
- [3] 田建荣. 科举学: 理论、体系与方法[J]. 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0(2): 70-74.
- [4] 郑若玲. 科举学: 考试历史的现实观照[J].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0(4): 90-95.
- [5] 覃红霞. 科举学研究: 在学科与专学之间[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3): 78-82.
- [6] 覃红霞. 走向开放的科举学研究: 兼论科举学学科与专学之争[J].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4(8): 15-20.
- [7] 刘海峰. 科举学导论[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6.
- [8] 李均. 从专学到学科“科举学”的应然索求[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3): 47-50.
- [9]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知识的不确定性[M]. 王 昊, 等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104.
- [10] 陈燮君. 学科学导论[M]. 上海: 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1: 229-231.
- [11] 费孝通. 略谈中国的社会学[J]. 高等教育研究, 1993(4): 1-7.
- [12] 刘海峰. 科举学导论[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
- [13] 瞿葆奎, 唐 莹. 教育学科学分类: 问题与框架[A]. 瞿葆奎. 教育学的探究[C].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1-28.
- [14] [美]约翰·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 郑继伟, 等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13.
- [15] 樊 倩. 对 GLNSST 知识生产模式的探索[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3): 21-25.
- [16] 邓正来. 反思社会科学: 学科的迷思[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1999(3): 22-29.

(责任编辑 沈广斌)